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论文集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经验	冯正钦 (1)
国共合作, 振兴中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邹荣庚 王关兴 (9)
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作用	季鸿生 (24)
试论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	徐爽述 (33)
抗战时期刘少奇对军事战略转变的卓越贡献	周鸿根 孙道同 (42)
略谈刘少奇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	许维之 邹正洪 (54)
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政策的几个问题	贺世友 (62)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 是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	朱学成 (72)
《救国时报》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胡正豪 (8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	

.....	王荣刚 (90)
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出现及其相互关系	
.....	王世根 (100)
试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原因	
.....	刘凤瑞 (113)

·中国国民党与抗日战争·

国民党抗战路线浅析	
.....	江忠民 (121)
略论蒋介石对日态度的演变	
.....	王剑秋 (130)
略论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	
.....	蒋自强 余福关 (143)
淞沪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	
.....	卞杏英 (152)
武汉会战经过及其失败原因	
.....	徐金裕 (160)
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	
.....	余亚平 (166)
抗日英雄谢晋元	
.....	虞宝棠 (174)

·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

上海军民的抗日斗争	
.....	周 熊 (183)
“八一三”前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纪要 (1937年7月7日—11月	

12日)

-吴景平 毛承豪 (192)
- 评“救国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
-郭绪印 盛慕真 (203)
- 爱国知识分子在上海“孤岛”时期的反日斗争
-林常溱 (215)
- 孤岛时期颇有影响的《译报周刊》
-朱宗玉 (226)
- 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同济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刘作民 屠听泉 (237)

·抗战中的爱国华侨·

- 论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舒志超 (247)
- 华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林炯如 杨美琳 (256)
- 爱国华侨的光辉旗帜——陈嘉庚先生
-施存富 (267)

·抗战时期的日伪政权·

-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伪政权述略
-刘其奎 (276)
- 日伪“清乡”概述
-杨元华 (288)

·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

斯大林与中国抗战

.....朱敏彦 (302)

苏联出兵东北的前前后后

.....陆启华 朱剑良 (311)

浅析抗战前夕英、美、日在对华经济侵略上的矛盾

.....张义渔 (321)

抗战时期史迪威对中国共产党的现实主义态度

.....陈 挥 (327)

抗战后期赫尔利在华活动评述

.....何继良 (337)

浅析太平洋战争前的中美关系

.....突 晖 (347)

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崔雅大 (357)

·动态与资料·

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论述简辑

.....费佩君 (367)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抗日斗争(资料)

.....吴信忠 宋兆山 (388)

八年抗战,解放区损失知多少

.....黄志浩 (399)

抗日战争时期的报刊广播事业

.....孙武霞 (404)

中国共产党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经验

冯正钦

一九三七年九月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①。

中国共产党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方面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

一、善于以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分析与掌握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科学地分析阶级关系，是正确地制定与执行政策的依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紧，中国进入了一个阶级关系大变动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与实现，就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大变动作出正确分析的结果。

第一，正确地掌握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变化。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它时而参加革命，时而中立，时而附和反动。在大革命后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经附和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但是并没有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使他们受到严重的损害。这就决

定其政治倾向必然发生新的变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曾经列名于弹劾共产党文件的国民党监察委员蔡元培和充任过江苏省清党委员的杨杏佛，毅然于一九三二年底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开展了争取民主自由运动。曾经同蒋介石秘密达成反共协议的冯玉祥，也于“九一八”事变后发表抗日救国主张，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变化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情况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②。

第二，深刻地洞察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分化。

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其生存与发展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他们都要投靠帝国主义。但是，由于侵略和统治中国的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各个帝国主义都要在中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因此，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形成了不同的集团，会产生政治上的分化。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虽然在一九三二年曾经暂时调和了双方的矛盾，建立了反革命联盟，但是到一九三五年他们之间的矛盾又重趋激化。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与掠夺严重损害了英美和蒋介石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们的对日态度都有了微妙的变化。美国公开声明，在华北有着“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的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正密切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③ 蒋介石也表示：“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

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④。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实行改组，亲日派势力遭到严重削弱。

对于这种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生动地分析，他说：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⑤。到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已表现出有“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的情况下，^⑥我们党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总方针”。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现出对内对外政策开始有了基本的转变时，党中央又及时抓住这种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倡议“再行整顿革命三民主义的精神，实行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⑦

另外，在国民党内部，在统治中央和地方、统治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的军阀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派别与矛盾。当日本的侵略直接侵害他们统治地区的利益时，他们也会有某种程度的抗日倾向。例如，一九三六年秋天，当日本侵入绥远东部，威胁到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统治利益时，他为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实力考虑，提出了“守土抗战”的方针，决定利用共产党抗日拒蒋。我们党便抓紧时机，促成山西统一战线的建立。又如，占据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也同蒋介石集团有深刻的矛盾。一九三六年春，也以抗日为名，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党中央及时指出这是“反动统治内一个重要部分转向抗日讨逆的开始”，“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

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④指出：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

总之，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善于以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对复杂多变的阶级关系作出科学的判断，就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建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巧妙地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⑤ 为了实现同非劳动人民的合作，中国共产党把当前的革命运动和长远的斗争目标相结合，使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第一，善于根据不同的形势和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明显地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历史发展要求我们加紧发动民族革命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据此，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口号。为了实现这个口号，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党在这一阶段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号召基本实现后，“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⑥ 从一九三七年二月起，争取民主成为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没有民主自由，就不能巩固抗战需要的全国和平与团结，也无从进行抗战需要的人民的动员。党在这一阶段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口号，以便继

续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第二，适时地根据阶级关系的变化作政策上的调整。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鉴于民族资产阶级等已经转向抗日，“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④指出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一九三六年八月，鉴于国民党政府已有转向抗日的可能性，党又“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⑤这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和彻底胜利。以后，随着国共合作的初步实现，党又适时地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第三，实行积极的让步或妥协。

一九三七年二月，党中央为团结全国一致抗日，曾对国民党政府作了重大的让步。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将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纲领。这种让步与妥协是必要的、积极的，它促成了团结抗战局面的实现。

第四，采用多种合作形式。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党曾经提出过多种合作形式。一是把国民党本身变成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持其独立性；二是各党派共同组织民族联盟，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各级共同委员会，可以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但必须依据共同纲领进行工作。但是，蒋介石坚持“溶共政策”，因而都遭到拒绝。结果，第二次国共合作既无成文的共同纲领，又无固定的组织形式。

在山西是以牺牲救国同盟会作为与阎锡山合作的组织形式的。党通过这个组织开展群众运动，掌握地方政权，发展革命武装。

此外，党为了“经过哥老会这个桥梁，去打入下层社会，去接近广大群众”，^⑥还以共产党员加入哥老会的形式开展对哥老会的团结争取工作。

总之，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卓越地运用了策略的灵活性，就能团结和争取广大的同盟者，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着重克服“左”倾关门主义

“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在世界观上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它们都不能正确掌握复杂多变的阶级关系，不能分清敌、友、我及左、中、右，不能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地统一起来，从两个不同的极端阻碍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有着产生“左”右倾错误的深厚的社会根源。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必须注意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裂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的错误。因此，在促成资产阶级由分裂走向合作的过程中，“左”倾关门主义往往成为主要危险。当时，自大革命失败后逐渐滋长起来的“左”倾思想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对于政治上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都还认识不清。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必须着重反对与克服这一错误倾向。

为了肃清“左”倾关门主义的严重影响，贯彻新形势下提出的新策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进行了一系列艰巨的工作。主要是：

第一，强调重新学习。包括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掌握贯串于理论中的核心，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克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以思想的转变保证党的策略的转变。

第二，提倡务实精神。

不仅要认真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以便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體环境中去”，^⑥而且“要善于细心地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⑦以便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贯彻党的总任务与总策略。这样，就从根本上克服“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及有关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与落实。

回顾党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的伟大号召。现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一

国两制”的主张。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携手团结起来。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⑩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5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137页。

③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第287页。

④ 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⑤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4页。

⑥ 《六大以来》上第779页。

⑦ 《六大以来》上第827页

⑧ 《六大以来》上，第763页。

⑨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6页。

⑩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4——235页。

⑪ 《六大以来》上第739页。

⑫ 《六大以来》上第775页。

⑬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8页。

⑭ 《六大以来》上第743页。

⑮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页

⑯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20页。

国共合作 振兴中华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邹荣庚 王关兴

今年九月三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今天正当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统一祖国，实现“四化”的时刻，缅怀四十年前国共两党团结御侮，振兴中华的光辉业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一九三五年日寇又染指华北，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

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组织东北游击战争，打击日寇。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对日寇宣战通电》，号召以民族战争驱逐日寇出中国，求得民族的彻底解放与独立。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再次发表宣言，要求全国人民与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

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政策亦开始向抗日的趋势转化。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为日本《经济往来》杂志撰文《如何改善中日关系》，文中说：“中国对于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①。以后又派人北上做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的工作，要他们拒绝日本“华北自治”的要求。与此同时，他还派出一部分兵力沿陇海线北上佯动。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九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对外关系的讲话，认为：“苟国际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可以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并表示如果日本无止境地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那末他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二十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时强调：

“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同日他电令宋哲元，提醒他不要中了日本“诱陷之毒计”，要他“仍本初旨，坚定应付……万一彼方因此不满，对兄等为局部压迫，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兄弟后盾……。”^②由于蒋介石的反对，日本未能使宋哲元在十一月二十日宣布“自治”，但继续向宋施加压力，妄图迫其在十一月三十日就范，（未果）。

一九三六年七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以蒋介石为议长。蒋介石在会上对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对日寇侵华的态度更趋明朗强硬。他说：

“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王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④接着蒋介石又派张群与日本代表举行了八次谈判。十一月十日，蒋介石指示张群：“应以完整华北行政主权为今日调整国交最低之限度。”⑤因而谈判未获结果。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向外务省报告说：近来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提案之态度已因其国内外形势转趋强硬。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日寇指使蒙伪匪军向绥远大举进犯，驻绥远的傅作义部奋起还击。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绥远抗战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发表声明说：“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实加以侵犯或干涉，万一不幸而发生此种非法之侵犯或干涉，必竭全力防卫，以尽国家之蒋介石政府的上述表现，职责也。”⑥对于当时毛泽东同志就曾给予肯定，他说“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实为近可喜之现象”，⑦“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⑧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关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对外维持领土主权，对内进行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对日问题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它比二中全会对所谓“最后关头”的解释前进了一步。初步完成了蒋介石国民党从对日不抵抗政策向抗日方面的转变。这种变化，是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团结，共同御侮的目的，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为国共再度携手作了一系列努力。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作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不仅重申了上述主张，而且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十大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一九三五年冬，蒋介石指示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秘密交换意见。与此同时，他还指示陈果夫、陈立夫和曾养甫等人在国内寻找与中共联系的线索，以“打通共产党关系”，进行抗日谈判。一九三六年二月底，国民党密派张之华等二人专赴陕北与中共中央直接接洽有关合作抗日事宜。同年一月至七月，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周小舟遵照中共北方局指示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在南京进行了多次谈判。五月五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六月，潘汉年从莫斯科抵沪，同陈立夫会谈后赴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指出：“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希望“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这个文件由潘汉年带至南京与国民党继续会谈。九月一日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重申了上述主张。十一月十日潘汉年又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商谈，并提出中